

# 生成视角的传统村落风貌整体性保护方法研究\* ——基于福建杨源古村案例

The Integral Protection Method of Traditional Village Based on Generation Principle: A Case Study of Yangyuan Village in Fujian

朱曼丽 杨昌新 黄莉芸 ZHU Manli, YANG Changxin, HUANG Liyun

**摘要** 从生成原理的视角出发,以山水文化、社会文化和宅形文化3个层面的文化活动为线索,揭示文化、人的活动与空间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旨在确立科学的认知,以克服既有传统村落保护体系中的构成思维所导致的遗产资源碎片化、表象化、布景化和空间活力衰落等不利问题。提出相应的文化活动活力评价方法,以挖掘传统空间的历史价值、阐释聚落风貌的生成逻辑。在此基础上,以文化活动为脉络,梳理和整合建筑群落、空间节点和行进路径,以此作为划定保护分区的依据,促进村落风貌的整体性保护。

**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ration, the paper takes the cultural activities at the three levels of landscape culture, social culture, and house culture as clues. The study reveals the inherent correlation between culture, human activities, and space, which helps to set a scientific view and to overcome shortcomings such as fragmentation, representation, scenery, and decline of spatial vitality of heritage resources caused by the compositional thinking in the existing traditional village protection system. Then a corresponding evaluation method for the dynamism of cultural activities is proposed to explore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conventional space and explain the generation logic of settlement style. On this basis, taking cultural activities as the context, the architectural complexes, spatial nodes, and travel paths are sorted out and integrated, which is used as the basis for demarcating protection zones to promote the overall protection of village styles.

**关键词** 生成视角;传统村落;风貌保护;整体性

**Key words** generative perspective; traditional village; landscape protection; holistic conservation

文章编号 1673-8985 (2025) 04-0057-07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1982/j. sup. 20250408

## 作者简介

朱曼丽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智能建造学院  
助教,硕士

杨昌新 (通信作者)

福建理工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  
教授,博士,281758465@qq.com

黄莉芸

福建理工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  
副教授,硕士

## 0 引言

在乡村振兴语境下,需要高度重视中国传统村落的文化资源价值及其风貌特色,因其蕴含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文脉、文化记忆、生活内涵、乡土美学、人文意蕴和社会演进轨迹等信息<sup>[1]</sup>,具有寄寓乡愁、传承文化、建立民族自信和实现中国梦的重大价值。然而,在现实的城乡建设中,传统村落面临着发展与保护

的诸多挑战,传统风貌面临着衰微与异化的双向窘境;如何维系传统村落风貌的完整性,彰显其风貌特色,并改善空间品质,以适应新时代的需求,有赖于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审视既有的保护规划研究,可发现较为倚重构成思维,即将重点落在功能分区和风貌要素的分解上,亦即在对历史建筑、传统群落和环境对象的研究中,重视要素解析,而忽视

\*基金项目: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社区营造’理念下传统村落闲置空间评价方法与再生机制研究——以福建土楼聚落为例”(编号2024J01832);山地城镇建设与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基于智能体建模的山地城镇历史街区仿真模拟与数字化保护研究”(编号LNTCCMA-20240101)资助。

其内在的复杂关联性。在这种思维模式下,难以保护传统村落的系统性价值与整体面貌,亦无法扭转空间碎片化的趋势。有鉴于此,本文关注传统村落风貌的整体价值及各要素的内在关联性,研究风貌生成与演化的机理,并提出相应的评价方法和规划策略,以克服风貌破碎化、布景化的窘境,让传统村落在当代转型中延承风貌特色,成为历史记忆与当代语境的纽带(见图1)。

1 传统村落风貌整体保护的学理依据  
1.1 构成原理下风貌评价和保护方法的缺陷

构成论思维范式认为,系统的部分先于整体,整体由部分组成,因而把控部分便可把握整体<sup>[2]</sup>。《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编制基本要求(试行)》采用“二分法”,将村落景观风貌系统划分为物质性与非物质性两类要素。物质性要素涵盖聚落选址特征、自然景观构成、空间格局形态、建筑风格特色和历史环境遗存等方面;对非物质性要素即村落所承载的文化遗产,进行翔实的调查、研究和分析;在较大范围及邻近区域内比较归纳村落间资源、条件的差异与特点,评估其历史、艺术、科学、社会等价值<sup>[3]</sup>,以确定各个部分的保护内容和保护措施。总体来看,传统的保护逻辑是:风貌系统整体是部分的加和,认为抓住所有的部分便相当于把握了整体。显然,这种对传统村落的物质性要素和非物质性要素的分别处理,不仅割断了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的线索与纽带,同时也忽视了对传统聚落景观风貌生成过程的考察和生成机制的探索,进而丧失了对风

貌系统整体性的认知和把控<sup>[4]</sup>,最终难免会对实践产生不利影响。

1.2 生成原理下风貌整体价值与机制的认知  
1.2.1 文化关联效应下的风貌整体价值

不同于构成论的思维,基于复杂性科学的生成原理则主张风貌系统整体先于部分;部分是在系统成长过程中分化出来的,其生成过程是从无形状态到有形状状态的转变过程,即文化观念的信息态向物质空间的实体态的转化。因而,认知风貌系统的整体性,生成论主张要从考察风貌系统生成的起点和过程开始,而并非只是现存的状态;即要将传统村落风貌系统还原到最初的起始状态——生成元(见表1)<sup>[5]</sup>,以此来认知风貌系统种子的初始整体形态,以及促发其萌芽的原动力和生长过程中的引导力量,从而认知传统空间的活力来源和传统风貌的整体内涵。

从生成视角出发,可从3个方面来认知风貌的整体价值。其一,追溯传统村落风貌系统生成的起源。根据田野调查及族谱溯源,可以发现,传统村落风貌的形成根源可追溯至氏族先祖对理想居住环境的初步构想,这一构想具体体现为对居住空间的图式化表达、地理环境的意象化选择和风水格局的象征性诠释等文化信息。这些概念性要素不仅反映了早期先民对自然与人文环境的认知方式,也为村落的空间形态与文化特征奠定了理论基础。如福建政和县杨源村的“双凤衔翠”图式、福鼎金钗溪的“四象把口”意象、南靖塔下村的“太极喝形”意涵等,这些信息内含族群的生存经验与传统,即所谓的文化价值体系,它是生成传统村落风貌样态的原动力和目的因。因此,从生成起点来看,风貌整体性实为文化价值体系的综合。其二,考察传统村落风貌系统的生长过

程。相关研究已经表明,在传统社区群体的生存过程中,后代亲族藉由生存空间外延扩展与优化,实现传统村落风貌的填充和叠加。在此过程中,宗教仪式、民俗活动和族规制度等文化载体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代际间传递族群价值观与文化认知的关键媒介。通过情境化的文化实践,后代得以体悟先辈的经验智慧,并将其内化为指导生存方式与营建行为的规范体系。因此,从生长过程来看,风貌整体性隐含着代际之间的经验传承与文化关联。其三,解析“风貌”的概念内涵。诸多学者已有研究,“风”代表着传统社会人文取向的文化价值体系,是隐性机制;“貌”是传统社会总体环境特征的综合样态,是显性表征;“风”促成了“貌”的显现<sup>[6]59-60</sup>。“风”作为隐性机制,承载了传统社会的文化取向与价值观念;而“貌”则是显性表征,表现为传统社会环境的总体样态与空间特征。两者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关联,“风”作为文化驱动力,塑造了“貌”的具体表现形式<sup>[6]60</sup>。据此可以解译风貌概念,即风貌整体性是文化价值体系与物质环境体系的综合。

综上,文化价值体系是风貌系统生成与演化的隐秩序,它不仅是风貌整体性的纽带,也是风貌整体性的内核,同时与风貌特色有着紧密的关联性<sup>[7]</sup>。认知风貌系统的整体性与文化关联性,才能更好地推进传统村落风貌的整体性保护,确保风貌特质得以保存与繁育。

1.2.2 风貌系统文化机制的作用机理

关于风貌系统文化机制的作用机理,伯克利学派研究认为:文化是动因,人是行为者,环境为被动对象。换言之,文化价值体系依托且作用于人的主观能动,促成具有价值偏好的特定物质环境的生成。在此作用过程中,传统社会主体及其各种活动起着纽带的作用。借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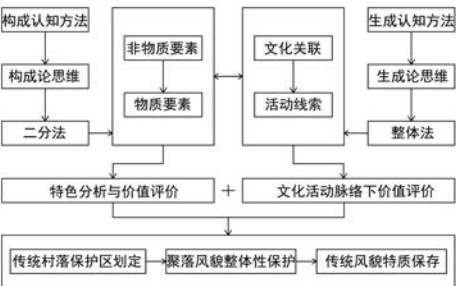


图1 研究逻辑框架

Fig.1 The research logic framework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表1 风貌构成论与生成论的比较

Tab.1 Comparison between composition theory and generative theory

理论	出发点	研究对象	研究方法	理论工具
构成论	部分先于整体	风貌要素与空间结构	把整体还原为部分	还原论
生成论	整体先于部分	风貌生成与时间演变	过程还原到生成元	演化论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伯克利学派的研究论断,本文从以下两条路径来认知文化机制的作用机理。

一是对文化机制的类型与特征进行系统性梳理与归纳。从生存论的视角来看,传统文化是社会群体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积累的适应性经验,体现了先民与自然环境及社会结构互动的智慧结晶<sup>[8]</sup>。在传统农耕社会中,族群的生存与发展主要面临三重维度的挑战:首先是自然环境的制约与适应,其次是社会关系的协调与整合,最后是个体与家庭空间的营造与维系。基于此,传统文化可划分为山水文化、族群文化和宅形文化3种类型,分别对应上述三重挑战。其中,山水文化主要作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调节,通过宗教仪式、风水观念等表达对自然力量的敬畏,并以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作为族群生存的基础;族群文化侧重于社会关系的规范与整合,通过族规、礼俗等机制维系社区内部的秩序与协作;宅形文化是作用于行为人自我与家庭关系调和的机制,它以生活行为要素凸显家庭的权力次序,并影响且表现于居住空间架构与功能序列。上述3类文化与传统,对应人的环境能动改造之动力机制,作用于传统村落风貌系统的建构。

二是解读文化机制的作用过程和途径。

以历时性的视角,可以将传统村落的社会发展划分为定居、繁衍、繁荣3个不同的阶段;与之相对应,传统风貌的成长进程亦可归纳为3个重要环节:起始、叠加到复加。依此,风貌系统生成过程可描述为:构想愿景—描绘图式—相地择居—风水喝形—开基营建—生成雏形—拓展空间—改良环境等诸多步骤。在此基础上,尚需理解上述3种文化机制是如何作用于各具体环节和过程。拉普卜特 (Amos Rapoport) <sup>[9]</sup>认为,文化价值观的表达主要依托于意象与图式、理想与意义;同时,它亦转化为特定性期望与限制性准则,规范行为人的社交倾向、行为方式和选择偏好 (见图2),并以此积蓄人力、财力与物力,最终促成特定物质空间环境的生成与演化。显而易见,在择址定居前,山水文化“自然为先”的观念影响着先祖相地择居意向及风水格局的构想,借助与自然的相处之道,订立“高勿近阜而水用足,低勿近水而沟防省”的择居原则,确立自然山水安全运行的边界,以限制、引导择居与营建行为;开基营建、拓展空间之时,族群文化“血缘亲疏”的观念决定了“宗祠坐中、四围分布”的聚落社会空间的差序格局<sup>[10]</sup>。与此同时,宅形文化“天人合一”和“崇宗敬祖”的观念,

则促成了“天井居中、厅堂坐轴”的空间布局,以及长幼尊卑空间方位的分布。

综上,风貌整体性隐含着文化关联性,以传统文化活动为纽带,风貌整体性表现为文化作用和活动传承。文化机制通过活动方式传承与改造族群代际的观念,限定和规范人的选择、偏好与建构行为,敛集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以满足传统社会族群所期待的生产、生活、习俗和宗教等活动的需要;进而逐步促成宗族愿景由无形的非物质状态向有型的物质载体状态转化,并经由微观—中观—宏观的物质样态逐级越迁,最后呈现出山、水、田、林、建筑、聚落生态的整体景观风貌 (见图3)。

2 生成视角下传统村落风貌整体价值评价

2.1 以文化活动为脉络的评价体系

生成理论认为,文化关联性蕴含在传统村落风貌构成中,文化机制作用于代际营建和景观生长过程中,而人的能动性则以文化传统活动为脉络和依托。

调查表明,传统社会文化活动的兴衰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传统村落物质空间与景观风貌的兴盛与否,若以文化传统活动为依托,推敲传统村落风貌的内在文化关联性,或是挖掘风貌整体性价值的有效路径。因而,下文将以传统文化为线索,进行文化活动活力度与关联性的分析,以评估传统村落风貌的整体价值。

引借哈罗德的六何分析法 (“5W 1H”),结合活动或事件传播的五要素<sup>[11]</sup>,建构评价体系以评价传统文化活动的活力,从久远度、传承度、空间化、制度化和广域度等方面展开 (见图4)。其中,“久远度”追寻文化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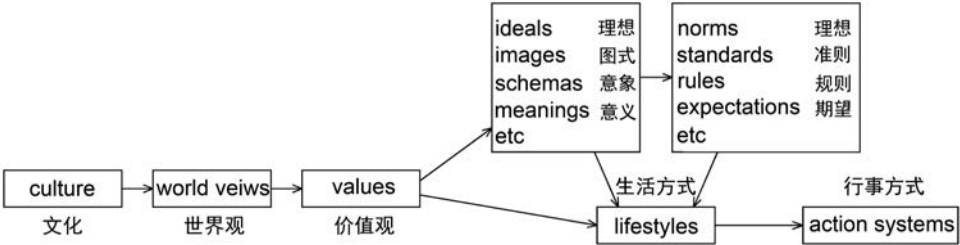


图2 文化机制的作用  
Fig.2 Role of cultural mechanisms

资料来源:拉普卜特《文化特性与建筑设计》,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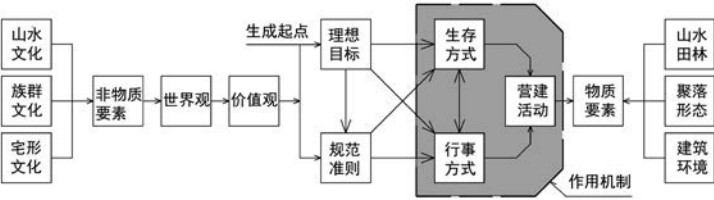


图3 传统村落风貌生成和作用机制  
Fig.3 Generative and function mechanism of traditional village styl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文化 活动	评价内容					活力 评判
	久远度 (时间)	传承度 (人物)	空间化 (地点)	制度化 (缘故)	广域度 (结果)	
宗教信仰	起始时间	连续程度	参与规模	建构物数量	建构物规模	活力充沛
传统习俗	历时长度	组织建构	建构物数量	建构物规模	建构物规模	活力一般
日常生活						活力衰微

图4 传统文化活动的活力评价  
Fig.4 Vitality evalu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activiti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起源于何时 (When)、历时多久、是否因某些原因曾经中断过。“传承度”追问的是什么人 (Who) 参与了这项活动、经历了几代人的传承、传承机制如何架构、参与活动的人数多少。“空间化”用以推敲与该活动相关建构物物的尺度参数、场所范畴和路径分布 (Where)。“制度化”考察的是为什么 (Why) 该活动会形成仪式体验、口口相传或祖训家规等不同传承形式。“广域度”评价的是该活动传播的范围,以及不同地域该活动的仪式倾向和形态差异 (What)。依据以上建构的评价体系展开考察,可深入阐释传统社区主体的价值认知体系、居住理念及其与物质空间结构的耦合关系,从而以整体性思维考察和把握传统村落的风貌要素。

2.2 杨源古村传统活动的脉络梳理

杨源古村隶属福建省政和县杨源乡,位于洞宫山与风山凹一线的东南坡,其东接周宁,南临屏南,西与建瓯、星溪毗邻,北与镇前接壤 (见图5);境内山岭绵亘,平均海拔800 m以上,具有独特的高山“二元地理”气候。特色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特征造就了杨源村的特色宗教



图5 杨源村区位图  
Fig.5 Location of Yangyuan Village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资料自绘。

信仰、传统习俗和风土人情。杨源古村始建于公元889年,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与丰富的文化内涵,其文化活动脉络清晰且具有典型性。其中,宗教信仰体系涵盖山林崇拜、鲤鱼图腾、李三娘信仰等多元形态,这些信仰实践不仅是文化象征,更构成了聚落选址逻辑、生态安全认知和生育文化经验的传递机制;传统习俗体系以祖先祭祀、游神仪式和地方戏曲为载体,通过仪式空间的需求与象征意义,直接塑造了聚落的组团结构、街巷肌理和公共节点的空间秩序;风土人情包括新娘茶、日常生活方式、房屋营造技艺等,引导生成传统民居的空间组织模式和建筑形制特征 (见表2)。

为了深入理解杨源古村风貌的生成过程,以助于保存风貌完整性和风貌特色,一是对杨源古村的传统文化活动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厘清古村落历史环境与族人意愿及传统文化活动的内在关联脉络,即“形”“意”“法”上的契合度;二是通过分析评价传统文化活动的久远度、传承度,以及空间化、制度化和广域化的程度,对比分析各类文化活动的历时性社会影响,明确其独特价值与核心定位;三是系统解构传统文化活动的仪式流程,将其空间化表达与建筑实体、场所节点、路径系统进行对应分析,运用空间图示法呈现活动轨迹并标注关键空间要素;四是量化评估文化活动的参与主体特征,包括参与规模、年龄结构、传承模式等核心指标,统筹评议该项活动的活态程度。

基于上述研究,笔者对杨源古村传统文化活动做出活力评价 (见表3)。总体来看,杨源古村传统文化活动整体上表现出式微的趋势。其中,山水文化中的鲤鱼文化在杨源乡、镇前镇一带依然鲜活如昨,还更多了一份生活情趣的色彩;而杨源古村社会文化、宅形文化则

随着宗族力量的瓦解逐步趋于衰微,表现为活动举办脱离常态、参与人员数量减少、活动资金集募困难、物质空间日趋衰败、技艺传承后继无人等窘境。

3 生成视角下传统村落保护方法探讨

基于上述分析研究,笔者认为生成原理视角下的传统村落保护方法需要以传统文化活动为线索,首先合理界定环境协调区、建设控制地带、核心保护区这3类保护区范围,藉此整合传统村落的物质环境与精神空间,以有效保存村落风貌的完整性和特质性。下文以保护框架建构和3类保护区划定展开阐述。

3.1 传统村落保护框架建构

以杨源古村为案例,基于其山水文化、社会文化与宅形文化的文化基质特征,系统解析文化活动与物质空间的耦合机制。通过整合传统资源评估方法与风貌价值评价体系,以生成视角建构传统村落的保护框架 (见图6)。其内涵包括:首先,通过划定保护区域范围,制定分级保护策略;其次,明确技术标准与管理规范,确保保护措施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最后,建立文化基因传承体系,培育传承主体,激发空间活力,实现传统村落的整体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3.2 环境协调区:基于自然景观完整性

杨源古村的环境协调区,即为村落人居环境自然景观风貌的保护区域<sup>[12]</sup>。其一是生态安全视角。以村域为界,将水脉、山体、湿地、林田等纳入环境保护的范围,保障自然资源、生态系统健全,其重在体现天人合一的因果协调,以及生产与生活空间的依存逻辑。其二是视觉和谐视角。以杨源传统聚落为核心,将自然风貌协调范畴聚焦于其周界的第一重山丘,用以

表2 杨源古村传统文化活动的组成  
Tab.2 Traditional cultural activities in Yangyuan Village

类别	活动名称	类别	活动名称	类别	活动名称
山水文化 (宗教信仰)	山林崇拜	社会文化 (传统习俗)	祖宗崇拜	宅形文化 (日常生活)	新娘茶
	鲤鱼文化		杨源四平戏		民居廊桥
	李三娘文化		提线木偶戏		营造技艺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界定环境协调区的基本依据,确保聚落风貌视觉上的完整性,使人工主景与天然配景错落掩映。其三是风水格局视角。杨源村始祖运用古代风水学的相地之术,以杉鲤承輿,得祥瑞之地,即采用倒栽杉树、放养鲤鱼的方式来辨别土壤、水流、风向、植被等自然条件的适居与否。杨源古村的选址格局呈现典型的风水文化特征:北依凤山为屏障,南以案山为对景,鲤鱼溪自西向东经水口山英杰庙形成闭合水系,构成“双凤衔翠、龙蟠福地”的象征性空间构建(见图7)。通过风水要素与环境调谐区的系统性分析,其选址特征不仅符合“枕山面水”的传统空间范式,更彰显了山川形胜、物候条件

对生存与繁衍的重要意义。依此,规划划定的杨源古村环境协调区面积为 44.05 hm<sup>2</sup>,其东

至水口山,西南以南山为界,北含双凤山,南括桃花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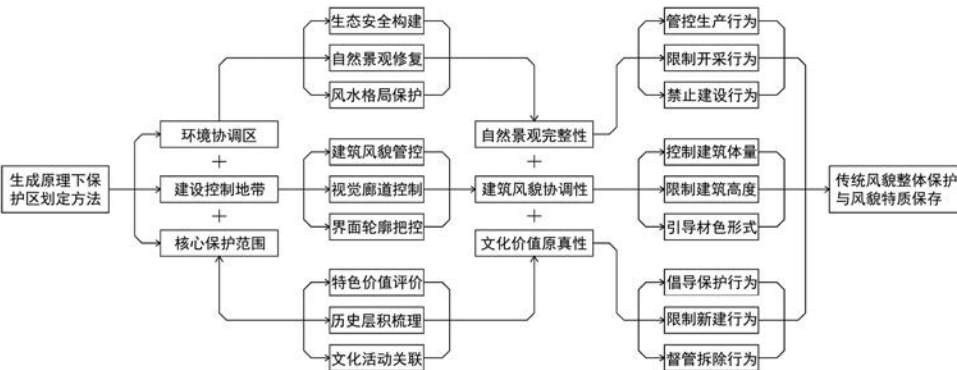


图6 生成视角的传统村落保护框架  
Fig.6 Conservation zoning and techniques under generation perspectiv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表3 杨源古村传统文化活动的活力评价

Tab.3 Vitality evalu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activities in Yangyuan Village

名称	久远度	传承度	空间化	制度化	广域化	评价
山林崇拜	祭拜山神,保护杉林。始于张世豪开基相地之时(公元889年),历时1 000多年,延绵不绝	该传统沿袭协调31代,形成宗族一家庭的传习模式。现因人口外迁,参与族人日益减少	保护对象:双凤山、风水林、倒栽杉(千年)等;祭拜场所:双凤寺、天王庙	以杉鲤承輿,得祥瑞之地。通过护林公约、祭拜仪式、族规家训进行教化	杨源村	活力一般
鲤鱼文化	把鲤鱼视为祖传神物加以敬畏和爱护。始于唐代,鼎盛于清嘉庆年间,历时1 000多年,延绵不绝	该传统沿袭31代,形成宗族一家庭的传习模式。现因人口外迁,参与族人日益减少	鲤鱼溪,鱼陵。严禁捕食鲤鱼,死亡之鱼葬入鱼陵,违者严罚。路径:溪滨路	始祖张世豪试养鲤鱼以验证宜居否,通过护鱼禁约、族规家训、仪式体验进行濡染和教化	杨源乡、镇前镇	活力一般
李三娘文化	李三娘文化始于唐宋年间,每年正月十五举办祭祀活动,该传统历时1 000多年,延绵不绝	李三娘文化世代传承,形成以家庭为中心的传习模式。现因人口外迁,参与族人日益减少	祭奠场所:铁坑殿(清代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省保)、圣母殿	祭拜“救产、护胎、佑民”的妇童保护神,以获取精神力量;通过仪式体验进行濡染和传承	政和、周宁、寿宁、建瓯、古田、福州、台湾	活力一般
祖宗崇拜(游翁爹)	始于宋崇宁年间(1102年),每年两次祭祀(八月初六、二月初九);传统历时1 000多年,延绵不绝	祖宗崇拜传统世代沿袭,形成以家庭为中心的传习模式。现因人口外迁,参与族人日益减少	祭拜场所:英杰庙(康熙元年(1662年),省保)、祠堂、桃花岛、巷弄、溪滨路、场地空间	缅怀先祖,凝聚宗族力量;通过游翁爹庙会的仪式体验、戏曲教化等进行濡染和传承	杨源村	活力一般
杨源四平戏	由弋阳腔演变而来,明末清初由徽州传入;历时350多年;世代沿袭,每年农历二月初九和八月初五上演	现第15代传人:张孝友、张望洋(61岁);从戏班到业余剧团;现传承方式:小学培训班	观演场所:英杰庙内的古戏台、天井和观演厅	杨源四平戏是始祖张谨夫妇庆诞仪式;四平戏传习特点:有词无谱,口口相传	杨源乡	活力衰微
提线木偶戏	明代开始盛行,历时400多年;世代沿袭,文革时期中断,后又复苏	现有传承人有吴来旺、邓永协和张树楚;以木偶戏班的传承形式,现面临传承危机	表演场所:村头、村尾、宗祠前埕等空间	提线木偶戏是族人祭祀、庆诞的娱乐仪式;传习特点:有词无谱,口口相传	杨源、镇前、外屯、东平等乡镇	活力衰微
新娘茶	明代盛行,每年五月初四(端午前夕),新媳妇人家以“端午茶”招待众乡亲。习俗历时400多年,世代沿袭,延绵不绝	新娘茶习俗世代传承,形成以家庭为中心的传习模式,通过敬茶仪式进行濡染与传习。现因人口外迁,参与族人日益减少	宴请场所:传统民居的厅堂和合院,以长桌宴的形式	让新人快速融入社会群体,并接受待人接物的教化;通过宴请、敬茶等仪式体验得以传习	杨源村、坂头村	活力一般
营造技艺	木拱廊桥营造技艺繁荣于北宋,历时900多年,北宋覆亡后逐渐销声匿迹。20世纪被重新发现,2009年成为世界级非遗	营造技艺现有传承人较少,现有:刘庭万、杨显华,面临着传承危机	杨源现存百年历史的廊桥:洛岭桥(县保)、矮殿桥和昌梓桥;特点:石砌桥墩和护岸,以梁木穿插别压成八字结构木座	营造技艺传习方式:师授徒承,口口相传	闽东北政和、寿宁,及浙西南泰顺、庆元等	活力衰微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政和县志》(1994)和杨源《张氏族谱》(1807)整理自制。



3.3 建设控制地带:基于建筑风貌协调性

通过制定区域规划建设管控措施与技术规范,有效维护核心保护区的环境稳定性,确保历史风貌的完整性与协调性<sup>[13-14]</sup>。划定杨源古村建设控制地带,基于环境稳定和风貌协调的原则,其途径是:其一,确保边界视觉上的和谐,以杨源村落核心保护范围为界,遵循纺锤形视廊原理<sup>[15]</sup>,结合现有场所、建筑、地貌的状态,将控制地带划定为边界外250—300 m不等宽的区域;其二,确保线性空间风貌的完整,归纳重要景观节点及其相关的线性街巷和视廊,将此类线性空间两侧界面统设为控制地带;其三,确保生态环境的稳定,关注保护区邻接的山脉、水脉,划入控制地带,避免因开山破土、截弯取直带来的地质灾害威胁到核心保护范围的安全。上述3条路径的耦合为杨源村落建设控制地带的主要依托,此区域内所要控制的内容涉及建筑的疏密度、体量、装饰、用材和适建项目等。那么,规划划定的杨源古村建设控制地带面积为15.04 hm<sup>2</sup>,其东、东北以杨源村双凤山等高线为界,北至杨源乡客运站以

南、西、西南、南、东南以 833 县道、202省道、建筑用地边界线、自然山体等高线为界。

3.4 核心保护范围:基于文化价值原真性

传统村落核心保护范围是指为了保护古村落的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的完整性,通过特色分析与价值评价选定保护对象,并根据其分布状况而划定的保护区范围<sup>[16]</sup>。运用生成的视角,在定性与定量的特色分析和价值评价基础上(见图8),采用文化关联和活动线索的方法划定保护区域,才能更好地实现传统村落风貌的整体保护。划定杨源古村核心保护范围,首先,追根溯源,研究杨源村的发展脉络,聚落形态的演化,梳理具有不同历史价值的物质空间(见图9);其次,以传统文化活动为脉络,通过活动路径、集散节点将自然环境要素、人文环境要素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具有逻辑关联的空间脉络的叠加(见表4,图10a)。依据上述思路,界定杨源古村核心保护范围总面积为5.43 hm<sup>2</sup>:西北以圣母殿北面 and 通往圣母殿的巷弄为界;北至杨源村双凤寺;东至杨源村双凤山

脚下,起于双凤寺,止于鲤鱼冢,东南、南、西南至202省道;西以鲤鱼溪、杨源乡政府边上道路为界(见图10b)。

4 结语

传统村落是依托血缘和地缘为纽带联结而成的社会系统,其氏族结构传统且稳定,文化内涵朴实且深邃。由传统氏族个体组成的基层生活共同体,将同自然和社会长期交互而成的生存经验和价值观念,蕴藏于纯始自然的传统文化活动与仪式中。通过公约制度、家规族训等文化载体,将集体记忆转化为个体行为的认知框架。这种文化内化过程既通过行为规训机制引导成员的生产方式与价值选择,又在限定范畴内,以族群集体价值观为前提容纳个体的创造。于是,村落的风貌特征便在上层宗族规范的引导与下层个体实践的调适之间逐步

表4 杨源古村以传统文化活动为线索的空间整合  
Tab.4 Spatial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activities of Yangyuan Village

文化	活动	空间
山水文化	山林崇拜	双凤山、风水林、倒栽杉;祭拜场地;双凤寺、天王庙
	鲤鱼文化	鲤鱼溪;鱼陵、溪滨路
	李三娘文化	祭奠场地,铁坑殿、圣母殿
宅形文化	新娘茶	传统民居:厅堂、合院、回廊
	祖宗崇拜	祭拜场地;溪滨路、巷弄;英杰庙、祖堂;桃花岛
社会文化	四平戏	英杰庙古戏台、天井和观演厅
	提线木偶戏	村头、村尾、宗祠前埕
	营造技艺	洛岭桥、矮殿桥和昌梓桥;石砌桥墩和护岸,梁木八字结构木座



图7 杨源古村选址特征  
Fig.7 Location character of Yangyuan ancient settlement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和自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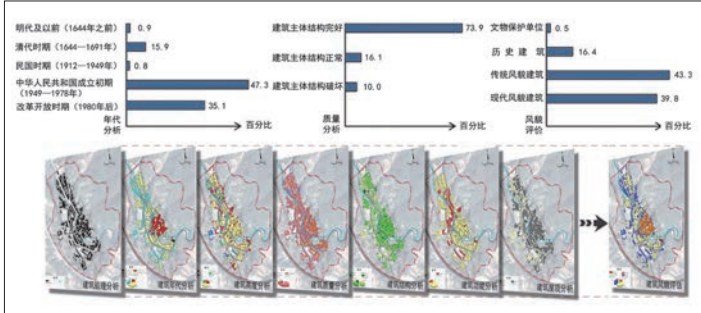


图8 风貌特色分析和价值评价  
Fig.8 Feature analysis and value evaluatio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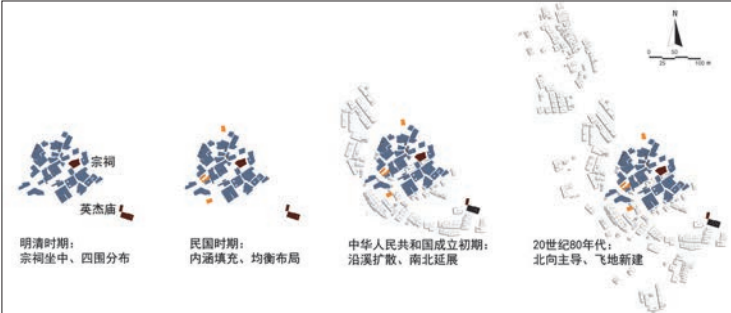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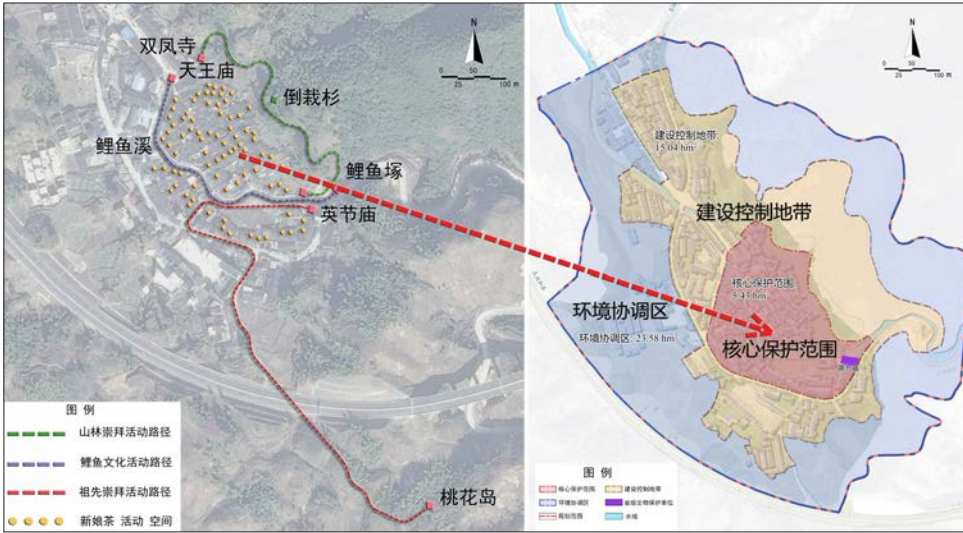


图9 杨源聚落形态演化  
Fig.9 Morphological evolution of Yangyuan ancient settlement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α 杨源传统文化活动空间  
图10 杨源传统文化活动空间和杨源传统村落保护区划  
Fig.10 Spaces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activities and protection division of Yangyuan Villag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形成的,这一过程既包含了对传统价值体系的传承,也体现了对现实环境的适应性调整,其历时性的物质空间形态也在约束力与适应力的动态博弈中不断演变得以生成与延续。

针对传统村落,既有的保护思路往往聚焦于横切面上的时间片段,是基于分类、建档、评价基础上的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而运用生成的思维,倚重时间纵断面上的追本溯源,可整合出一种历时性视野、人文取向的传统村落风貌特色价值评价方法,进而挖掘生成的机制和动因、划定核心保护范围和制定保护方法。基于此,本文研究工作具有一定探索性和创新价值。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张京祥,申明锐,赵晨. 乡村复兴:生产主义和后生产主义下的中国乡村转型[J]. 国际城市规划, 2014 (5): 1-7.  
ZHANG Jingxiang, SHEN Mingrui, ZHAO Chen. Rural renaissance: rural China transformation

under productivism and post-productivism[J].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14(5): 1-7.  
[2] 金吾伦. 从系统整体论到生成整体论[J]. 科学时报, 2006 (11): 1-2.  
JIN Wulun. From systemic holism to generative holism[J]. Science Times, 2006(11): 1-2.  
[3] 住建部. 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编制基本要求(试行)[Z]. 2013.  
Ministry of Housing an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Basic requirements for the compil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plans (trial)[Z]. 2013.  
[4] 魏锦达,周庆华,胡家骏. 城边型非典型传统村落整合性更新研究——以泉州江南片区为例[J]. 上海城市规划, 2024 (4): 116-122.  
WEI Jinda, ZHOU Qinghua, HU Jiajun. Research on integral renewal of urban fringe atypical traditional villages: a case study of Jiangnan Area in Quanzhou[J].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Review, 2024(4): 116-122.  
[5] 杨昌新. 从“潜存”到“显现”——城市风貌特色的生成机制研究[D]. 重庆:重庆大学, 2015.  
YANG Changxin. From "concealing" to "showing": a study of the generative mechanism of cityscape characteristics[D]. Chongq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2015.  
[6] 杨华文,蔡晓丰. 城市风貌的系统构成与规划内容[J]. 城市规划学刊, 2006 (2): 59-62.  
YANG Huawen, CAI Xiaofeng. Study on the analysis and planning of townscape based on systematic theory[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06(2): 59-62.  
[7] 韩胜发. 基于结构—要素分析的传统村落保护范围划定方法研究——以查济村为例[J]. 上海

城市规划, 2019 (3): 113-118.  
HAN Shengfa. A method study of defining the conservation area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based on the structure-element analysis: a case study of Zhaji Village[J].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Review, 2019(3): 113-118.  
[8] 和辻哲郎. 风土[M]. 陈力卫,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  
TSUJI T. Local customs[M]. CHEN Liwei, translate.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2006.  
[9] RAPOPORT A. Culture,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M]. Chicago: Locke Science Pub. Co., 2005.  
[10]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5.  
FEI Xiaotong. Rural China[M]. Beijing: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2005.  
[11] 周正楠. 媒介·建筑:传播学对建筑设计的启示 [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3.  
ZHOU Zhengnan. Media architecture: insights from communication studies on architectural design[M]. Nanjing: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2003.  
[12] MAYOR F. UNESCO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J]. Museum International, 1972, 25(1-2): 452-458.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Z]. 2003.  
The State Council of PRC. Implementation regulations of th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relics[Z]. 2003.  
[14] 国家文物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要求[Z]. 2004.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Administration. Requirements for the preparation of the national key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plan[Z]. 2004.  
[15] 西村幸夫,等. 城市风景规划——欧美景观控制方法与实务[M]. 张松,蔡敦达,译.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5.  
NISHIMURA Y, et al. Urban landscape planning: European and American landscape control methods and practices[M]. ZHANG Song, CAI Dunda, translate. Shanghai: Shangha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2005.  
[16] 住建部,国家文物局.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编制要求(试行)[Z]. 2012.  
Ministry of Housing an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Administration. Requirements for the preparation of the protection plan for historic and cultural cities, towns and villages (trial)[Z]. 2012.